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一期 ——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304c)

【劫后反思】	我们去红卫兵墓园该凭吊些什么？	谌旭彬
【不堪回首】	老来忆“牛棚”	郝 斌
【往事非烟】	中国文人的别样文字——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章诒和
【人物春秋】	曲弦的命运	周孜仁
【各抒己见】	记下老红卫兵的血债——读老红卫兵的回忆录	彭小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 页：//mus 阎长贵 eums.cnd.org/CR](http://mus.guochangui.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劫后反思】

我们去红卫兵墓园该凭吊些什么？

• 谌旭彬 •

### ◇ 导语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28日早间有新闻称该墓园将在今年清明节将对市民开放，晚间又有新闻称该报道不实。

墓园清明节究竟是否开放，目前尚是未知之数。但值得思考的是，倘若真的开放，我们去红卫兵墓园，又究竟该凭吊些什么呢？

### 01、墓园或将开放，武斗的历史却还相当混沌

“红卫兵墓园”这个并不确切的名称，恰如那段历史的叙述一般，有一种不谋而合的似是而非。重庆文革武斗的前因后果，迄今缺乏深入的专业研究，本节所提到的内容，只是真相中的极少一部分。更详尽的还原，只能留待来日。

◇ 墓园内埋葬的大多数是工人，“红卫兵墓园”的名称并不恰当

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645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 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8月26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

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1966年8月的重庆出现。8月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6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8月26日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1967年1月6日，晚，沙坪坝区12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1967年1月24—26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2月8日，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1967年7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5月开始的，“5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6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

则始自7月8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7月25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8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7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7月20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8月9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1967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10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2778支，子弹11万多发，炮109门，手榴弹9831枚，各种机动车辆67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 02、文革虽已否定，对它的历史认知却还常常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主流语境里，“文革”已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是一场必须被彻底否定的历史浩劫。

但遗憾的是，因为对历史真相认知的不完整，今人对文革的认知常常误入歧途。本节所举，不过其中较典型的几例而已。

#### ◇ 错把什么都归罪于造反派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而文革中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不为普通民众所了解。于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抢的罪恶都笼而统之地全部归罪于造反派了。举个例子，《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3辑》收录有一篇《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传略》。据该文介绍：“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下，郑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诬为‘黑帮’，被扣上‘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和庇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罪名，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在他点名批判的四十天中，他始终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离关押三天时间，遭到无情的折磨摧残，1966年8月2日被迫害致死。”

按这段描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死于“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众所周知，林彪、江青当时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郑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吗？并不是，恰恰相反，周家瑜等人组织造反派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愤恨于郑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郑思群的其实是重庆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组，工作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对象。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随意套个“造反派”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 ◇ 错把文革“大民主”当作“民主”

将“文革”视作“大民主”，可谓时下的“文革”怀念者们的共同认知。这一认知有一个特殊的出发点，即“文革”前夕官民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经济层面，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有很大关系；政治层面，与历次运动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关系。“文革”来了之后，许多民众得以通过随意的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等手段，将其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发泄出来。这种自由，确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

但这种“大民主”绝非什么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这种“自由”是单向度的一一所有人都可以在运动中“自由”地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其结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实的案例可查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极大的“禁锢”，与“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二，“大民主”虽然确实给了民众某些自由和权利，但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同时也必须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1966年，造反派们被赋予“大民主”的资格，1968年造反派被镇压，该资格又被收回；可见“大民主”的有无，全赖高度集权的权威的個人好恶。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这些自由和权利本应由民选的权力机构和民主制定的法律来赋予，也应在这个民选权力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运行。

何况，即便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泽东，也从未将“大民主”视作自己固定的价值观。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就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狠批过“大民主”：“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还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

#### ◇ 错把文革当作“多数人的暴政”

与“文革”的怀念者们不同，时下“文革”的批评者尤其喜欢用“多数人的暴政”来形容“文革”，且将其视作“文革”的实质。“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提出来的，意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宾派专政。

但文革却绝不是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原因其实也相当简单：文革实际上更近似于一场提线木偶戏。所有取得胜利的群众运动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数百万强大的军队在背后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文革期间所谓的“多数人”，根本无力对任何其他群体实施“暴政”。在转型时代，“多数人的暴政”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发生的现象，但将文革视作“多数人的暴政”，却显然误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它从发动伊始，就承载着高层明确的政治目的，一直到运动结束，它也从未真正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它自己尚且是提线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数人的暴政”？

从一位当年的武斗参与者对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时的心境的回忆中，不难体会这些“施暴者”的“提线木偶”性质：“两派武斗，双方都有枪，我们这边是县武装部发枪，枪更多，还有炮。打起来以后，对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败退了，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们打了胜仗，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倒是吓坏了。毕竟开枪的多是中学生，不知怎么办。面对倒下去的人和鲜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不知所措。这怎么交待？既有政治上的责任，又有良心上的东西。像是在恶梦里。这时，有一个干部，成年人，出来讲话，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他说，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大家的情绪这才转过来，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那么怎么打都可以，而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问题解决了。人的心理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要求。只要这一条界限越过了，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庆功大会，大造舆论。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战争中每次大的战斗之后，都要开大会，庆功授奖，军事统帅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解决士兵打死人以后的心理负担。”（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群中学生，实体武器是县武装部发的，思想武器是成年干部灌输的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是傀儡又是什么呢？

#### ◇ 错把文革与西方同时期的青年造反运动相提并论

1967年、1968年，文革风起云涌时，西方青年的左翼运动也搞得风生水起。这种同期性，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文革的造反运动与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运动本质上相同或者相似——其实，这种认知在文革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运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将其视作中国“输出革命”的成果。

这种认知可谓彻底的南辕北辙。第一，西方的造反运动，是社会内在自发酝酿的，完全不同于文革是上面煽动起来的。第二，即便这些西方造反运动在形式上乃至经济上对中国有所依赖，但在具体的诉求上，却与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别。以法国学生1968年造反的“五月风暴”为例，其基本诉求是警察退出校园，大学应该精神和思想独立。后来学生与警察爆发武力冲突，工人加入进来，其诉求也很理性：1、支持学生，警察退出校园；2、结束失业，增加工资。而中国的造反派，当时呼喊的口号却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并无现代公民意识在其中。

#### ◇ 错把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当作文革受害者的主体

不论是文革的怀念者，还是文革的批判者，这两个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通老百姓没受什么太多伤害。确实，文革结束后，在各种场合发声控诉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长期成为媒体上以亲身经

历控诉文革罪恶的主体，确实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们。

但事实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声都忙不及，自然也顾不上为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发沉默，恍若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县大屠杀等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即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数目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武斗也是如此，一开始造反派确实主要针对保皇派，保皇派里确有不少老干部及其子弟，但保皇派被镇压下去之后，武斗在在造反派内部发展到高潮，死伤最多的，其实还是普通百姓，一如重庆红卫兵墓园内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

结语

一切历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须建基于真相的披露。只有真相，才能把反思落到实处；也只有真相，才能让反思达成共识。

□ 原载《腾讯历史频道》2013.3.29

~~~~~

【不堪回首】

老来忆“牛棚”

• 郝 斌 •

作者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历史系的“牛棚”先后关押过三十多人，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当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 ◇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梗、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濤、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糍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



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梗、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梗、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梗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纲，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

“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实实。

据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当此之时，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绝不能过夜，这已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被悄没声地闷了下来，是何缘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突然。我家住在东单，距北大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送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 ◇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全系师生尊称他为“翦老”，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题，污指翦伯赞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紧接着，毛泽东自己出来点了翦伯赞的名。

翦伯赞一因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看一场猴戏——您看，批斗会这个玩意儿，出世不过一年多的光景，这么快就异化变种了，当初的威严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几分恶搞和揶揄。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

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

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半点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优待，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云南打游击，大军入滇的时候，任某县县委书记，为配合解放，带领十几个人去守卫一座桥梁，那是大军必经之地。他们刚到桥边，还没站稳，就忽听枪声大作，而据报解放大军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学生出身，从没有放过枪；手下的人也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听到枪声，就慌了神。他本以为此桥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随着枪声到来的正是大军，于是他把此桥视为再生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是回归到知识分子圈子，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四十多岁了，方才成家。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的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篋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篋作助手，汪篋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他极富思辨力，讲起课来，依据材料，纵横对比，把事情分析得透辟入里。1954年，我听他讲“中国通史”的秦汉部分，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一节，他居然用去了四节课时间，听得我们全班都饶有兴味，明知进度耽误下来了，也都心甘情愿。除夕之夜，他到学生宿舍，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喝醉了，随便倒在哪个学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们到他家请教，谈到晚上10点左右，不管几个人，照例一人一碗汤面。我们三口两口下肚，他边说边吃，最后半碗又劳夫人重新热过再拿来。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篋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篋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篋之死，时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过，以各种方式抗争自戕者，用拳脚和各种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赶入“牛棚”、有病无医、寿未终而正寝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队来，我的老师汪篋是头一名，在他之后，还有62人一个一个随他而去。在历史系的5个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赞，熬到了1968年底，

各种屈辱都已受尽，最后一样走了，倒也免除了后来的许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上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二百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正是：

何物圈养复散养？  
栏栅有形无形中！

□ 原载《南方周末》

~~~~~

## 【往事非烟】

中国文人的别样文字——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 章诒和 •

二〇〇九年一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他又说，张伯驹的“交代”写得既长，也杂。所以只复印了一份题目，以及与章（伯钧）罗（隆基）有关的文字。

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的那么多人物呢？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一九五六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毋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像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一九五七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一九五九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六一年十月，我来吉林省工作。六二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壁）。六三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顿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五七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骈赋，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情性。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柳塘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五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 原载《共识网》  
~~~~~  
【人物春秋】

曲弦的命运

• 周孜仁 •

曲弦是云南理论界一大才子。其父乃中国著名生物学家曲仲湘。本人则毕业于河南大学数学系：那是共和国在呼啸战火中呱呱坠地之时，于是他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投笔从戎，慨然随军南下，在昆明军区作干部教育工作，毕其一生。他生命中最辉煌、也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又最为莫名其妙的一段故事，发生在1971年夏天。

一年前，在庐山的政治群峰间上发生了中共党史上又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宣判中共著名理论家、他曾经的秘书陈伯达为“假马列主义”的“政治骗子”，并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之。曲弦的人生转折从此开始。

1971年初，云南省委按中央统一部署召开会议，第一书记周兴发表演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号召对陈伯达开展大张旗鼓的批判。讲话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效果是，周的讲稿一经报送中央，伟大领袖看了，于是欣然命笔，批示：“很好，照发”，这个讲稿于是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发（1971）37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实施之。周兴的这个讲稿，就是曲先生主持起草的。

其时，曲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调研组。主要任务是起草调研报告、政策文件、首长的重要讲话云。他在调研组的职务本不算高，仅组长处级而已。最重要的一——这儿需要说明了——“政治骗子”陈伯达乃中共中央理论喉舌《红旗》杂志原主编，该陈一遭整肃，立马换了一根“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上场：大名鼎鼎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金棍子”重组《红旗》，于是普天下寻觅笔杆子。不知怎么回事，大概就因为那个37号文件吧？曲先生很快被锁定了。中组部一个电话，他调北京便成定局。据说，云南省惜才如金，曾试图进行抵制，理由实在太

过勉强：曲当时身穿军装，仍系部队干部，地方无法做主。中组部长杨德中一顿训：“部队怎么啦？部队照样属于中央管！”没辙了。云南方面只好乖乖欢送。

北京的调令大约是七月初下达的，欢送程序于是正式启动。我们调研组从此便再难觅曲组长踪影了。为什么？请吃啊，请喝啊！云南地处偏远，好容易出一个京官，而且是《红旗》杂志，据说还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如此显赫高位，能不吓人？不趁机联络联络感情而何？那时全社会生活困难，经济拮据，全无酒楼饭庄一说，欢送宴都在自己家里自力更生操办。曲乃好好先生，宴请者都是战友上司、达官显贵，他能拒绝吗？不能。我们组无钱无地，自然是无力宴请的，领导遂安排小字辈的我专约曲先生安排时间留影一张纪念。我和曲虽说同室上班，相处日久，可这一回，要约他合影留念却颇费周折，婉转预约多次，好容易才在8月28日那个中午，大家在昆明百货大楼对面的立新照相馆匆匆忙忙聚首，合影一张，算是遂了愿，接下来又赴宴去也。

曲先生上京那天，场面更蔚为壮观。几十部小车，浩浩荡荡往通向昆明巫家坝机场的小路一字儿排去，那场面简直堪与迎送外国元首比肩。我们虽为办公厅同事，亦全然近身不得，就坐一张大巴，远远跟着队伍尾巴殿后，缓缓慢慢，曲折蛇行。那年月坐飞机人烟稀少，巫家坝机场每日里不过三两航班而已，候机厅门可罗雀，飞机场场可罗雀。那一天却满满宕宕一下子涌来如此众多大小官员、如此热闹非凡情绪，昆明机场写史，此事断不可漏。作为朝夕相处的同事，在那种场合，我们想单独握手话别已不可得，于是只能遗憾地，远远地，望他登机而去。

其时，我和曲共事（具体说，我在他手下工作）已三年有余，深知他为人很书卷气：低调、正直、对于官场事多有不惯。我甚至完全相信，虽然高升，可在那翻云覆雨年代，他不会为此翘尾巴，忘乎所以的。几十年后看当初送别留影，他脸上的微笑平和而敦厚，当是证明。我甚至还相信，曲先生肯定是倦于那些没完没了的无聊应酬的，只是碍于情面，不得不敷衍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就在他赴京不久，1971年冬天我出差北京，专门去沙滩2号大院看了他。曲的住处本不宽，孤零零一人，加上气候阴冷，显得非常冷落。他一边捅火炉一边客气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说在北京工作视野宽广，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甚至国宴，常能见到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又说了，每次《红旗》杂志清样的大字本送毛泽东看后，如有批示，姚文元就会用塑料薄膜袋小心装上，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展示，如此这般一通。在云南省委机关我年龄最小，人微言轻，因此谁都不戒备我，曲更如此。在昆明时，每每和他独处，他总喜欢在我面前发牢骚，对官场争纷乱表现一些超然的、无可奈何的愤怒。1971年那个冬天，在北京，当我快要走了，曲先生又一次那样表情淡漠，冷不丁地对我说了一句：

“北京的斗争，比我们云南，复杂得多！”

我暗暗吃了一惊。这是说中央呀！矛头所指，不用明说，都是些君临天下的权贵！我不敢往下深究，那年月，事情到此已经够了。他显然憋得太久，见了故人，不吐不快罢了。孤独中人总是希望向人倾吐的。在北京的政治丛林，他相信他非常孤独。

果然，75年前后，他不知道找了些什么理由，曲先生终于挣回来云南了。那时，我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大案牵连险些身陷囹圄，后被发往工厂做工人，与上层机关再无往来。曲先生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在什么单位供职？我都浑然不知。关于他消息都是辗转听来，他以老伴身体不好，且不适应北京气候等等为由，在姚文元面前死乞白赖，最后不知道咋就成功了；又说，临别时，姚非常热情地对他交代，回了云南，他还是《红旗》的人，还得随时向中央报告那边的情况，云云。

麻烦的事情出在一年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垮台，全中国人人喊打。在第一时间我就猜想，这一回曲肯定难脱干系。事实上，我很快知道，他确实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他定期或不定期向姚文元打小报告，实乃“四人帮安插在云南的钉子”，此人不关而何？这就关了，还判了三年。四人帮安插的钉子才判区区三年，唯一的解释是，他确实打了小报告，但是他的报告肯定全是鸡毛蒜皮，无关大雅。判三年，不过象征性惩戒罢了。听说他关了三年，我就再次相信了我的判断：曲先生肯定还是那么书生气。依照他的为人，姚文元要他报告，他能不报吗？不能。他在云南生活多年，结交不少，他能得罪人吗？不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虚以委蛇，交差了事。这样就交出一个三年来了。

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同处一城，但为生活奔忙计，各自东西，却一直无缘谋面，直到2008年秋天，我无意间在河南大学校友会的名单上发现了他，便如时到他们的年会上寻找。正在人群中穿梭，突听身后有人小声叫，音细如蝇：“小周！小周！”回头看，呀！我们双方都老了。他已是八秩老翁，行动不便，靠手杖支持。而我，也年逾花甲。他依旧笑得那么平和敦厚。二人执手相向，刹那间说不尽的别情旧绪。

后来就去了他的家。是在军区一座很不起眼的老干休所。房子很旧很窄，没有任何装修。拿他的话说，这是原生态住房。老伴早已过世，女儿也出嫁多年。隔天来为他做一次饭。他一个人生活，屋子零乱冷清。他正在读斯多葛主义者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位稀奇古怪的罗马皇帝崇尚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主张安于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恬淡寡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除了腿脚无力，曲先生的眼睛看书也已很困难。我拿起这本新买来的哲学著作翻翻，再一次从小体的字上触摸到了这位书生不懈的理论激情。

最后，我困难地向他问了问案件的事，他轻松地一笑，不掩饰地说了：人家说，北京，《红旗》杂志，恁好的位置，你干吗不愿呆下去？干吗要主动回来？肯定是安插回来的奸细！他笑笑说：我长一千张嘴，也解释不清啊！

我说是的，这问题实在难以说清楚的。

但是我想我是说得清楚的。因为我了解他，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很复杂，因为人和人不同，这种不同因为出身、信念、教育、志趣和追求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我们除了希望理解，怎么能指望大家一律呢？

再说，那个年代本身就非常荒唐。

~~~~~

【各抒己见】

## 记下老红卫兵的血债——读老红卫兵的回忆录

• 彭小明 •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2012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



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 ◇ 中国版水晶之夜的法西斯冲锋队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

1938年11月9日纳粹冲锋队制造了柏林水晶之夜，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公开非法冲击犹太人家庭和商店，焚书、抄家、绑架、歧视和虐杀犹太人，成为持续的官方行为。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1949年开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

1966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10,275人？；被抄家为92,000户，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125,000户，《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动向》2011年9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 ◇ 老红卫兵负责人皆已触犯刑律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

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

陈毅之子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该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

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

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讞；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

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1960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 可笑的辩白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

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完全不足采信。难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

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50年代开始每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12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

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

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1946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

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发现了一份70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

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 Lucifer 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2008年德国导演甘塞尔 Gansel 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 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

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 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 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

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

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1970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

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1974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 ◇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

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

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

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僚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